

鲁南乡土

话说古峰城

□邵明忠

枣庄市峰城区的前身是峰县，峰县之前为峰州。根据《元史》和《峰县志》等史料记载：金代兴定（公元1212年）中建置峰州。峰州之前，宋代为承县，隶属沂州府。公元1196年，改承县为兰陵县，兰陵县为峰州首县。是时，经受了1400年风雨战乱的承县城（今峰城区坛山街道岳台与徐楼社区），又惨遭洪水的冲击而基本废弃。峰州及兰陵县官邸，只得迁徙到“土娄”（今峰城区吴林街道土楼河村一带）。继而，在仙坛山南麓建筑峰州城。

被毛泽东主席视为“只识弯弓射大雕”的“成吉思汗”铁木真，于1206年建国。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。这期间（1265年）将原来的兰陵县省略，并入峰州。元朝山东地方政区设为路、州、县三级，峰州隶属益都路。峰州与滕州、沂州、邳州、徐州为邻，峰州的版图比它之后的峰县版图略大一些。元朝州级政区分为三等：定地五万户以上为上州，三万户以上为中州，不及三万户为下州。峰州属于下州。

元朝的汉人不能担任正官。峰州州官的官阶为“从五品”，称作峰州刺史，或称作峰州知州。刺史或知州，表面上为一州之长，实质上并非主政的角色。由蒙古人充任的“达鲁花赤”之上，也是从五品，可是它凌驾于州官之上，是把握实权的正官。民众称达鲁花赤为“上马管军、下马管民，又能管同僚的官”。这种现象无形中造成了民族矛盾。金元之际，兵戈四起，致使人口流失、土地荒芜，满目荆棘。蒙古统治者不知农业的重要，不断有些高官提出把农田全部变为牧场。虽然这些荒唐的建议最后没有实行，但把农田变牧场的事件却不断发生。从忽必烈在位时，才逐渐拨乱反正，提出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衣食为本、农食以农桑为本”的治国策略。峰州地区出现了一些敢于讲真话、冒险向上司反映民生问题的好州官。诸如：任讷“劝课农桑”，积极发



展生产；王天祥“开田浚渠、灌溉四郊、民享其和”，保证了农民的正常播种；梁宜“岁时巡行阡陌，劝课农桑，垦田均农”，稳定了社会局势，等等。由于他们注重农业的恢复与发展，以前流亡外地的农民又重新回到家乡。

元朝后期，反元的呼声日益高涨，连绵不断的战争，愈演愈烈，进而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。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徐达、常遇春率师北伐，势如破竹；在元军与起义军的拉锯战中，三打峰州，几乎把峰州城夷为平地。三个月后，徐达平定了山东全境。1368年，朱元璋推翻了元朝，建立了明朝。由于峰州人民死伤惨重，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降峰州为峰县，人丁户口尚且不足。朝廷下令，强迫山西洪洞县的大批移民，来峰县定居。降制后的峰县，隶属济宁府（后改属兗州府）。之后，125年的峰州之名从此结束。

峰县城池，是明代洪武二年（公元1369年）降峰州为峰县之后兴建。峰城城址位于西汉时期承县遗址的正东方，在金元时期的峰州遗址南端。它背依仙坛山，西傍承水河。

峰县城初建时为一面光的土围子城垣，成化二年（公元1487年），由知县毛凤鸣整建为石头城，后经许承芳、李孔曦、王济踵、王希曾及江德容、马希曾、胡从礼等几任县官沿相加固增修，而逐步完善，形成了城池的规模。峰县城城墙周长4里多，高一丈五尺，厚度一丈，其内外壁面皆为长条块石料砌垒，中间填以夯土毛石以及白灰、麻刀、沙子等杂料浇制凝混，形成浑然一体的建筑结构。四面城墙皆置城门，北门名为近圣门，是因为曲阜孔子、邹城孟子和“兰陵令”荀子公署俱在其北方，故而得近圣之名；东门名为兴贤门，意思是朝迎日出，贤达人才与日俱兴，民间称之为喜门，是城里人家嫁娶及民间庆典活动的祥瑞之门；南门名为望仙门，具有向阳祭祀及送葬升仙的文

化涵义，又叫做葛峰门，因面向葛峰山（天柱山）而得名；西门名为迎恩门，是恭迎皇帝诏令，接见朝廷命官的官方活动的窗口，另外还有一个极端的用项，是处斩罪犯时，出西门，经“落魂桥”至河滩，赴刑场的出口。因此“出西门”便成为杀人的代名词。

峰县城的平面呈现一个方方正正的“口”字形，城墙外围有护城河。护城河从北、东、南三面人工河与西面的承水河接漕。它连同城墙构成“回”字形的整体。四面城门前皆建有石桥；其中西门外横跨承水河的孺子桥规模最大（桥长96米，宽6米，高4米，桥洞12孔）。

峰县城为邳州、台儿庄通往滕县、兖州，以及费县、枣庄通往利国驿、徐州等地的古驿道、官商大道的交叉处和咽喉要塞，是兵家用武必争之地。每逢战乱、厄祸的紧张时期，将西北东三个城门紧闭，把南门望仙桥的盖板石拆掉改用铁木制成的活络形的吊桥；根据时局的需要，可随时升降吊桥，以保持市安全。

峰县城的城楼（也称敌楼），皆为砖木结构，形如宝塔，上下两层，飞檐斗拱，雕梁画栋，中间设悬空板，周边设护心栏，高大森严，气势辉宏。它和万里长城的山海关等城楼具有同样的雄风，只是规格小于边关城楼而已。城楼高出城墙丈余，它是县城的城头堡，是护城军官的指挥所及瞭望台。特别在东西两个城门的里边，均建置“女墙”（副城墙）和“月城”（城内附加城），在危急关头，这对于抗御入侵者具有缓冲作用，乃至可实施“瓮中捉鳖”的战略战术。城墙上方的内外两面建有规格整齐的垛口；中间是平坦的通道。垛口既是守城士兵的掩体，又是装饰城墙的一道风景线。护城河边杨柳依岸，绿树浓荫与鸟鸣鱼跃相映成趣，为城池增添了生机与活力；更重要的是它作为自然屏障，发挥着第一道防线的作用。

明清时期，峰县城内及其周围的建筑群主要有衙门公署、官邸、巡捕厅、

马神庙、福神庙、二郎庙、三清观、文昌阁、养济院、水月庵、兴国寺、兰陵书院、城隍庙、校厂、马厂、关帝庙、山川坛、乡贤庙、文庙、清真寺等，主要商号有油坊、盐店、粮米店、当典行、粉坊、酒厂、金银店、铜锡店、冶炼厂、纺织厂、印染坊等。

直到清代中叶，山东省“九州十府，一百零八县”的行政区划相对稳定。“邹、滕、峰”是并列的山东名县。

峰城背靠仙坛山、东接姑嫂山、进食山、鹰嘴山、马鞍山、笔架山，西临汉王山、楚王山、青檀山、狮山、象山，群山连绵，形成凤凰展翅。仙坛山如凤头，因而又名“凤山”，其山体峭岩壁立，恰似腰箍，因而又名“玉带山”，方志称之为“镇邑之山”。由沧浪渊、光武泉、寺山泉等三川合龙的“承河”，拥抱峰城，擦肩而过。半城青山半城河的诗意之城。紫气东来，三面承风，左右逢源，四平八稳，的确是个祥和之处。所以，从西汉、金元到明初，虽然三迁城址，都是建在方圆十几里的版图内。历代沿革的承县、兰陵县、峰县或缙州、兰陵郡、峰州等行政改制十几次，此处一直是公署衙门的所在地。1938年，日本侵略军占领峰县城，日本军部公然把峰县西城楼的图案印在明信片邮票上，在军界发行。其狼子野心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。

峰城风水虽然好，然而，旧时代老峰县人总是不满足现状，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发牢骚，爱说“一成不变”这个成语，希望它能变得更美……

自从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，峰城城市建设规模大幅度扩充，已将两汉承县城、金元峰州城，明初峰县城等三座古城遗址珠联璧合，融为一体。大批的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，无声无息地缩短了城乡之间、工农之间的差距。面对超越千年的历史性突破和眼下骄人的风貌，即使是爱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人，也不得不承认——峰城巨变。

新书评说

□王艳君

存史资政谱新篇

——《薛城文史》第八辑序言

薛城，历史悠久、文化灿烂，古往今来孕育了众多名人志士——夏朝车正奚仲，开薛之治的商朝左相仲虺，主编儒家经典著作《孟子》的万章，养三千食客 of 孟尝君，焚券主义的冯谖，脱颖而出的毛遂……俊影星驰，各领风骚，留下千古佳话。近代以来，这里曾是震惊世界的民国第一案——临城大劫案的发生地，也是运河支队的诞生地和铁道游击队的主战场。无数革命英烈和仁人志士，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，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华美篇章，他们的崇高精神和辉煌业绩，与山河同在，与日月同辉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，发扬光大。

《薛城文史》第八辑经过编审委员会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，近期正式出版了。该书以翔实的史料、珍贵的图片，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古薛先民发展的历史脉络，勾勒出现百年薛城人民在鲁南革命斗争及社会发展中的恢宏画卷。这是薛城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地方区域文史研究的结晶，是全区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可喜可贺！

本书以时间为经，以事件为纬，从不同侧面描绘了薛城这片热土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社会风物等方面的发展变化，是一本既有文化品位、又有文史借鉴作用的书籍。全书以现当代史料为主体，兼收古代史料，分为薛国史话、临城纪事、战争烽火、抗战英烈、人物春秋、往事回眸、文革岁月、乡村采薇、民俗风情九个栏目，重点展示薛城人民从民国到改革开放以来生生不息的奋斗历程。古薛史话对新发现、新观点或能够使相关史料比较系统地留存下来的资料予以刊载，以供交流。现当代史料所选文章主要是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文革时期具有重

要影响的一些事件和人物，这些事件和人物在我区的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，理应在我区的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。在乡村采薇和民俗风情两个栏目中，以点带面地展现了薛城的乡风民情、民间俚语、文化遗产等人文风情。

我第一次阅读书稿时，惊讶和喜悦一起涌上心头。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些历史的片段是模糊或陌生的。因为有了这本书的出版，广大薛城人更能深入了解薛城历史这瑰丽多姿的一面，才能进一步感受到薛城历史醇厚、坚韧、质朴的气息。

薛城近百年的历史征程中，处处闪耀着先辈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光芒。这是薛城这座古老而又崭新城市的精华所在，也是激励后人、鼓舞斗志、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。本书的编撰出版，是一种传承，更是一种责任。但愿这些散发着薛城历史文化芳香的文字和图片，穿透历史迷雾，折射出薛城近年来的风云变幻、人事沧桑和发展变迁，让我们感受一次历史之旅、人文之旅。

知昔日始可喻今者，观往事所以察未然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需要我们牢记，更需要我们研究、挖掘和整理。我们要抱着无愧于历史、负责于未来的态度，挖掘整理出更多更好的文史资料，为人们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，建树更加美好的心灵家园。

《薛城文史》辑录成书，为古薛文脉传一信史，为薛城风物留一画卷，为鲁南文化存一佐证。编撰诸君，求宏文于史馆，搜轶著于乡野，其功莫大焉，堪称劳其著矣！

是为序。

文化寻根

光天烛地 一首歌

□丁兆如

元宵节古时也叫上元节、灯节。它最早源于东汉明帝，当时佛教传入中国，朝廷号召百姓于上元之夜放灯，以示对佛的尊重。后又经隋唐宋的发酵，元明清的延展，就成了我们中华儿女一个展示各地不同时期民俗特色的节日。

隋炀帝爱赏灯。大业三年（公元607年）的上元节，他挑选3万多人参加京城花灯表演，兴致处赐以元霄并赋诗一首：“灯树千光照，花焰七枝开。月影凝流水，春风夜含梅。”寥寥四个动词，两显两喻，便勾勒出元宵灯节那光天烛地、笙歌喧腾、如水如风的人流。真没想到，做什么事都好大喜功的杨还有这般才情，写出了这等枝叶葱茏的诗句，说来也算是性情中人的。

唐代，上元之夜前后三天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贩夫走卒，无不扎、挂“凡数千百种，极其新巧，怪怪奇奇，无所不有”的花灯。热闹的气氛引得皇帝倦儿也坐不住了，像唐中宗李显，景龙四年(公元710年)就与后妃出宫“微行观灯”，甚至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”。这般盛况除了官方记载，很多唐诗也见一斑：“谁家见月能闲坐，何处闻灯不看来。”(唐·崔液《上元夜》)；“千门开锁万灯明，正月中旬动地京。三百内人连袖舞，一进天上着词声。”(唐·张祜《正月十五夜灯》)；“月色灯光满帝都，香车宝辇隘通衢。”这是李商隐的溢美之词；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游妓皆秣李，行歌尽落梅，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”这是苏味道再现的畅快淋漓的游人。

与唐朝相比，北宋的上元节里多了一项很给力的内容，就是富贵人家的闺秀除了在月光下、灯影里和普通人家的女子赏灯、猜灯谜外，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借机约会心上人。这些平时深居绣楼不得随意出门的女子，唯这个时候，才被允许出去，她们也当然地利用好这段美好的时光。“今年元夜时，月与灯依旧；不见去年人，泪满春衫袖。”欧阳修说的就是这个中国式的“情人节”。

宋徽宗昏庸是昏庸了些，但按现在的话说，他做的一些事还是蛮阳光的。你看，每年的上元佳节一到，这倦儿都要上宣德楼饮酒赏灯，兴致所来，还赐酒赏那有幸一睹“龙颜”的女性。相传一妇人喝罢御酒藏匿金杯，不巧被禁军逮个正着，押至徽宗面前，问为什么要偷金杯，哪知这妇人端的厉害，慌张中竟拈出一首《鹧鸪天》：“月满蓬壶灿烂时，与郎携手至端门，贪看鹤阵笙歌举，不觉鸳鸯失却群；天渐晓，感皇恩，传宣赐酒饮杯巡，归家恐被翁姑责，窃只金杯作照凭。”徽宗听罢龙颜大悦，不仅没治罪，反而再赐美酒一杯，金杯也一并与了她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连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，上元之夜的花灯和人流也是通宵达旦摩肩接踵的。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，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”(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)；“夸毫斗彩连仙馆，坠翠遗珠满帝城。一派笑声和鼓吹，六街灯火庆升平。”(朱淑真《元夜》)。

“无月不娱人，有月无灯不算春。春到人间人似玉，灯烧月下月如银。满街珠翠游村女，沸地笙歌赛社神。”这是江南才子唐伯虎的元宵之灯，是明朝朱元璋规定正月里初八“上灯”，十七“落灯”，连续放上来十天让京城人赏个够的写照。

说到这里，不能不说陈毅元帅的一段佳话。一次，陈老总在前赴延安的途中，路过一个叫胡家坪的山村，说来也巧，那天正好是1944年的元宵节，战争环境虽是艰辛，但村民们依然陶醉在花灯的欢乐中。爱写诗的陈老总断无不诵之由：“敲冰踏霜麦垅前，半夜山村犹未眠。点点花灯当户照，齐占胜利在今年。”

悠悠灯火，源远流长。悠悠灯火，情长意切。它和着喜气洋洋的春联，蜜意深浓的诗词，一年一年的种，一年一年的收，一家一户的种，一街一巷的收。它种的是我们民族年轮的厚度，收的是我们民族大家庭的融融之情。

